

陈澧《东塾读书记》未刊稿考辨

吴茂榮 黄国声

清中叶后期著名学者、文学家陈澧（1810—1882），终生读书力学，著述勤奋，卓有成就。临终前一年（七十二岁），犹亲自审定未刊著作，到七十三岁那年病亟，“不能观书，则使子宗侃等捧书读之或默所为诗文”（汪宗衍《陈东塾先生年谱》）。《东塾读书记》是他瘁一生心力的巨著，但并未全部完成。现行《东塾读书记》（以下简称《读书记》）列有目录二十五卷，其中十六卷已成，其余九卷注云“未成”，是有目无书，盖仅存稿本而已。这个稿本即是咸丰八年开始撰写的《学思录》。但它的内容如何，流传何处，颇为人们所关注。这个稿本过去虽也有人提及，无奈都未亲见原稿，语焉不详，其下落更无人知晓，这就更增加了人们对它的渴望。

一九八〇年十月出版的《文献》丛刊第三辑载于乃义、李孝友二同志撰《陈澧（东塾著稿）考评》一文（以下简称《考评》），对云南省图书馆所藏的一部一百五十册陈澧手稿《东塾著稿》，作了颇为详尽的研究和介绍，得出的结论是：《读书记》的撰著，多取资于《东塾著稿》（以下简称《著稿》）的前半部，而后半部以及晋隋诸史等部分则是未刊印过的，以此知其珍贵，从而推断它是《读书记》的未刊稿，“是一部系统完整的著作”。

《考评》对《著稿》做了详细介绍，这对人们了解陈澧的著述活动及这部存稿是有益的，但其论断却有可商榷之处，现就我们所见辨析如下：

关于陈澧的《读书记》未刊稿真相，本来早就有过可靠的纪录。陈澧门人廖廷相在其辑印的《读书记》十二卷中附志云：“其余未成稿本十卷，遗命曰《东塾杂俎》……均侯门人及儿子编录云。”但见过这稿本的人恐怕少之又少，所以人们都不注意。现在《著稿》既是陈澧亲笔，内容又与《读书记》有关，其为人重视，自是意中事了。但这么一来，关于《读书记》未刊稿，却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东塾杂俎》十卷是《读书记》未成部分的稿本（廖廷相说）。

二、《东塾著稿》陈澧原题名为《学思录》，它即《读书记》未成部分的原名，而《著稿》即为其原稿（《考评》说）。

《考评》全文绝口不提《东塾杂俎》这个书名，尽管它出现很早并且相当可信。而我们正是要从这种扞格、分歧中找出其端绪来，以求得出未刊稿的正确结论。否则，你能说那一个才是真正的稿本呢？抑或陈澧同时有两个著作稿本留存下来呢？

怎样来拨开迷雾，探求真相？我们认为最好是从陈澧的治学方法入手。因为他的方法既承袭了前人的成功经验，又富有个人的特色。通过这方面的考察，将能帮助我们探究陈氏的著述过程和学术思想的形成经过，从而解开长期存在的未刊稿之谜。这就是我们写作本文的目的。

一、关于《东塾著稿》与《东塾遗稿》

《读书记》原列卷目二十五卷，系陈澧所自订。但他生前仅印行过其中的九卷。身后由门人、儿子等刻印过十五卷本，

是为通行本。另有一种少见的本子，卷首虽亦题为十五卷，但正文内多了卷十三《西汉》，则实为十六卷本。余下九卷目录下注云“未成”，是因为只有稿本，来不及整理刊印入内。

陈澧的著作，以《读书记》为最主要，其他未刊的著作尚多，计有文集若干卷，集外文《说山》、《陈兰甫先生陶诗编年》、《东塾初学编》、《自记》等。而最重要的当为《读书记》未刊的那九卷，倘能得到原稿补入，全书便成完璧了。

不幸的是，陈氏稿本在他身后遭受了兵、火及后人的斥卖，由此被毁或播散者在所不免，仅举几例，便足说明：

1、广东新会县人陈树镛，是陈澧弟子，他藏有其师的稿本。这些稿本的遭遇是怎样的呢？据徐信符《广东藏书纪事诗》说：“东塾遗文多藏于树镛家。当东塾病亟时，亲以遗书付树镛编定。迨辑成文集八卷，刻未半而树镛逝矣。树镛子复任职海军部，民国某年在北京逝世。藏书播散，著述稿本不少流于北平。”

2、据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载《正风杂志》）说：“番禺陈公睦庆稣及其弟公辅庆祐，东塾先生孙也。工词章，同仕京师。公辅早歿，其孤不肖，以所遗书尽售于打鼓贩，得值极贱。书数百册，皆有东塾手迹及东塾未刊文稿。”

3、《广东藏书纪事诗》又说：“近年东塾遗书多已播散，其稿本及评校本，余南州书楼搜藏最多。民国十三年广州政变，木排头陈氏故居付之一炬。《东塾丛书》、《东塾集》、《东塾读书记》版亦悉燬矣。”

从这些记述看来，陈澧的遗稿既曾散失于北方，又可能遭火于南国。因为陈氏故居之被焚，殃及稿本是很可能的事。至于徐氏南州书楼的藏书，解放前曾移度香港，有无散失，亦难悬知。《读书记》的未刊稿本是否尚在人间，是很引人系念的。现在云南省图书馆发现的《东塾著稿》，确是珍贵的手稿，《考评》对它作了较为详密的研究，先导之功，殊不可

没。但它未能为读者指出：《著稿》只是一部读书及治学的笔记，是资料的汇集，虽然间或有陈澧本人的见解议论错落其中，但充其量也只能算是著作的原始资料，而未能成为一部完整、条理的学术著作。

《著稿》的性质既然如此，那么《读书记》的未刊部分，就不会是《著稿》而另有其稿本的了。我们认为它就是中山大学图书馆所藏的《东塾遗稿》。

这部《遗稿》的来历是：一九二四年莫鹤鸣在香港向潮州人高隐琴、云南人廖行超借得东塾手抄小册数百本，即予抄录。录成后由何藻翔、邓尔雅、蔡守等人校对。初时本欲印行，以事不果。嗣后莫鹤鸣遂将此抄本赠给邓尔雅。邓氏为近代金石名家，广东东莞人，是容庚、容肇祖两教授的舅父。后来邓氏欲印亦未果，遂商之容肇祖教授，由容介绍转让与岭南大学。解放后院系调整，归中山大学图书馆收藏。至于其所据的原本，抄录后各归原主。廖氏所藏部分现入藏云南省图书馆，就是现在的《东塾著稿》了。高氏所藏早年已归前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全国解放前夕，恐已被运往台湾去了。①

《著稿》与《遗稿》只是一字之差，但它们都是后来汇订者所拟的书名，陈澧原在各小册子的封面上都分别题写过《读书记》、《学思录》等名称的。而此两者才是真正的名字。现为便于称述起见，仍称《著稿》与《遗稿》。

莫鹤鸣在抄录《著稿》时，可能有个打算，就是要尽量依照原本风貌抄写，所以抄录的本子也是巾箱小册子。对于眉批、旁注、圈点乃至涂抹，均依照原稿格式过录，复经名家校对，态度是颇为审慎的。所不同的是《遗稿》数量比《著稿》多得惊人，经核对，计多出八十七种，汇订后列目如下：

小学

一册

法言

二册

中说	一册	春秋繁露	三册
颜氏家训	一册	孝经纪事	一册
晏子春秋	四册	韩诗外传	一册
通典	一册	孔疏精要语	一册
逸周书	一册	郑学	十册
尔雅	一册	诗经	三册
淮南子	二册	史通	二册
商子	一册	汉唐目录	一册
白虎通	一册	史记	七册
周礼注	十三册	易	二册
列女传	一册	易疏	二册
公羊传	九册	易象传	一册
汉书(目录)	八册	周易口义	一册
毛诗(目录)	七册	吕氏春秋	七册
后汉书(目录)	八册	学思录	一册
论语笔记	一册	诸子、经总、隋书、音乐、	
唐疏类编	二册	杂录、汉宋	一册
郑氏书	二册	杂抄	一册
汉儒(陶、陆、韩)	三册	毛诗笺	一册
毛诗	五册	毛诗注疏	二册
新唐书	一册	论语、孟子	七册
诸史(原编者拟)	二册	谷梁传	七册
三国志	五册	论语	三册
易经	四册	论语集注(目录)	一册
易集解	一册	论语邢疏	四册
周易	一册	战国策	一册
易删	一册	琴说	一册
左传	二十册	仪礼注疏	七册
尚书	九册	仪礼例	一册
郡斋读书志	一册	学思札记	一册
默记(《著稿》亦有,但		近思录	四册
《遗稿》丢失一册)	一册	新五代史	二册

金史	三册	书法杂说	一册
大元书抄	一册	学校贡举私议	一册
朱子全书（目录）	四册	礼记分节	一册
称谓	一册	礼记注	四册
备忘	一册	礼记曲礼	二册
诗集传	一册	礼记、礼器	二册
宋元学案（书抄）	四册	朱子杂学辨 延年问答	一册
陶书集抄	一册	辽史	一册
读书记 小学、文章、诸		默记临川集	一册
子、道学、辽金元六册		朱子	四册
论语集解	一册	语类	一册
论语皇疏	一册	学思稿：语类、宋儒	一册
国语	二册		

以上合计多出八十七种（《默记》两稿均有，除外）总共二百五十四册。

另外，篇目相同，但《遗稿》册数比《著稿》多出者，计有：

琐记	《遗稿》有三十六册
	《著稿》为五册
默记（与前列不同）	《遗稿》有七册
	《著稿》为四册
宋史	《遗稿》有二十八册
	《著稿》为廿三册
诸子	《遗稿》有廿七册
	《著稿》为六册

以上共计多出六十册。两项合计，比《著稿》共多出三百一十四册，为其两倍有余。

不难看出，既然《遗稿》是照《著稿》过录复经校对而成，那又怎样解释与《考评》作者所列举的这种数量上的悬殊出入呢？（本来《考评》作者虽未见过《遗稿》，但也曾怀疑过《著稿》有缺略。可是却不知道缺略的原因，所缺的到底是

什么?)现在经过核对,我们认为《遗稿》所据的原本,是分藏高、廖两家的。今廖氏本为一百五十册,则其余者当为高氏所藏。何藻翔在提到借抄经过时,对原稿主人的提名是先高氏后廖氏,寓有以高氏所藏者为主、为多之意^②。《遗稿》淹有两家之富,数量较多就不足为奇了。

这样我们可以说,陈澧的《著稿》是其亲笔,固足珍贵,但非完璧。《遗稿》虽属过录本,则据全稿,在两原本未合璧前,则亦不容轻视了。

如此更可说明:连《遗稿》也不是陈澧的有系统的正式著作,更不可能是《读书记》未刊部分的稿本,而只能是一部资料集而已。

二、从《著稿》和《遗稿》看陈澧的治学方法, 据以证明“两稿”不是著作定稿

如何研究和认识“两稿”的性质,最好的办法是从考察陈澧的治学方法入手。

陈澧是怎样治学的呢?说来奇怪,他是从抄书开始的。一般来说,抄书就是抄书,怎能谈得上治学,抄书而曰治学,岂不降低其意义与价值?然陈氏的抄书,却自有其不同的地方。他对这种简单而又古老的方法很欣赏,他说:“澧读亭林集有抄书自序,述其祖训曰:‘著书不如抄书。’又自言:‘客游四方,有贤主人以书相示者,或手抄或募人抄之。’然则抄书乃顾氏家学,亭林所恪守者。”(《东塾集》卷四《顾亭林手抄曲江集,湛甘泉、邱琼山两序跋》)其实抄书之法,古人早已应用,如北周薛澄,终日读书,手自抄略将二百卷。宋人黄东发亦尝自言:“愚苦多忘,凡读书必略记所见”。(《黄氏日抄》)陈澧记忆力差,因抄书是古人读书的善法,便有意仿效。他曾说过:“读经史必须摘采,用《黄氏日抄》之法。”(《遗稿》廿九《著书·抄书·文章》)众所周知清代学者自顾氏

以后，如阎若璩、赵翼、王鸣盛等，莫不是以抄撮群书、博览广收的方法治学并取得巨大成就的，这无疑对陈澧产生过影响。而他所最佩服的还是顾炎武。顾氏著《日知录》，能够就一事而博采群书，旁及史部以外书籍，厚积而后融会贯通之，遂成巨著。这样，抄书已不是单纯的技术性工作，而是一种要带着眼光去读去抄，心领神会，采撮精要的功夫了。抄书与著述成了做学问的两个步骤，仅为先后之分而已。所以陈澧特别拈出顾炎武的这个经验来：

抑抄书之说有二：有抄而读之，有读而抄之。抄而读之者，抄书自序（按：即亭林文集中之抄书自序）之说是也；读而抄之者，《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皆其抄录群书而成一家之书。其学之博洽，乃或古人之所不及，此则抄书、著书合而为一，盖抄书之极功矣。（《东塾集》卷四）

因此他说：“予之学但能抄书而已。其精者为《汉儒通义》；其博者（非今人之所谓博）为《学思录》；其切挚者为《默记》。不复著书也。”（《东塾遗稿·默记》）话说得十分谦虚，然而他正循着顾炎武那种“抄书之极功”的方法去治学、去著述，去撰写他认为足以传世的著作。

由此可知陈澧的抄书，有一个详尽的著述计划和范围，作为他阅读抄撮的指导方向。《学思录大指》（《东塾遗稿·学思自记》）就是这样一种总纲。“大指”计开列了四十九个项目，他大体上是照着这些项目来进行阅读与采摭的。

那么，陈澧的抄法是怎样的呢？翻阅《遗稿》，会感到很有趣。他的方法是很灵活的，有时一篇文章，仅抄取一二句话，这就是他强调过的提要钩元的抄法；有时则是想起某事、某人而记下感想来，或发表些议论，以为他日采摭之资。但别以为这抄书工作是很轻松的。陈澧常说到自己治学的辛苦。比如他写《声律通考》，就花过不少心血。他的朋友郑小谷对他说过：“君著此书辛苦，我读此书亦辛苦。”（《东塾集·复

曹葛民书》)陈氏自己也说：“当著此书时，辛苦不可言。”

(《番禺陈东塾先生书札·致桂文灿书》)因为声律是专门之学，读之已颇感吃力，何况还要考证论述！但陈澧靠了毅力和良好的治学方法，艰辛备历，终获成功。这件事很感动了梁启超，他在《陈兰甫“声律通考”跋》中说：“先生复郑小谷书又言，购求陈暘《乐书》不得，可见寒士治学之难。难如彼而所成如此，先生盖过人远矣！”(《饮冰室合集》第十六册)又如陈澧所作的《切韵考》，相信也经历了不少困难。因为这部韵书在古代早已失传，而敦煌石窟的《切韵》残卷，则到清光绪末年才被发现，陈澧已无从得见。

从陈澧的治学方法来考察“两稿”，我们不难发现：“两稿”只是他读书、抄书阶段的产品。正如陈澧自己所说的：“仆近年为《学思录》，惟抄撮群书，不成著述之体，欲待二三年后乃编定之。”(《东塾集·与胡伯蓊书》)陈氏所说的《学思录》即现在的《著稿》，是尚待编定，未成著述的稿子。以后经多年编撰，晚年时定稿曾改称《东塾读书记》，临终又遗命改名《东塾杂俎》。现在我们反观《著稿》，感到它内容散漫重沓，序次淆乱，实不能算是著作的。《考评》说它“是一部系统完整的著作”，难以令人苟同。

三 《东塾杂俎》才是《东塾读书记》未刊部分的稿本

《东塾杂俎》(以下省称《杂俎》)这部书，在陈澧身后，亦不大为人所知，虽然廖廷相“志后”提到过这书名，但似乎大家都没留意，连广东著名藏书家徐信符的《广东藏书纪事诗》亦未提到这部手稿。直到今人汪宗衍所编《陈东塾先生年谱》才开始提到它。可能汪氏也未见到原稿吧，所以也只能在谱中说：“殆未编成，故未见传本也。”肖一山《清代学者著述表》于陈澧名下列有：“《东塾杂俎》八卷(即《读书记》后八卷)”，盖将“西汉”、“东汉”两卷除外，故云八

卷，但没有说明是稿本，可能肖氏亦未目睹原稿。

自陈澧之逝，至今百年。求索遗文，代有人在。然而都无法找到《杂俎》的踪迹。不料此一亲笔著作稿，却珍藏在中山大学图书馆内，已逾廿载。我们经过初步比较和与《遗稿》核对印证，益足征信这是陈澧晚年未刊的稿本，正是《读书记》未成部分的九卷，是陈氏在临终前最后编定的。这本《杂俎》的存在，廓清了既往众说纷云的现象，为陈澧《读书记》未刊稿之谜作出了正确的答案。

这部手稿是陈澧子孙的家藏本，五十年代时由陈氏长孙陈庆稣先生赠送给中山大学图书馆的。随同此稿送来的还有陈澧及其儿子宗侃、宗颖的一些手稿、书札以及陈澧的私章等。

陈庆稣是陈澧次子宗侃所生(1869年生)，因长子宗谊早逝无后，遂命庆稣出嗣长房。他幼承家学，十八岁考取番禺县学附生，廿三岁中副贡，廿五岁补广雅书院文学分校，光绪二十六年被举补为菊坡精舍学长。也可说得上是家学渊源，克绳祖武的了。以后捐纳为安徽知府，补道员二品衔归直隶补用，因此在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幕内都出任过文案。宣统二年，被派署驻美国檀香山领事，民国后留任。以后归国转入外交部门工作。解放后，陈庆稣先生于一九五三年以八十四岁高龄加入中央文史馆为馆员。

这份手稿原装订为十七册，未编卷数，但每册封面均亲笔标明卷目，如“辽金元”、“国朝”等，其数恰与《读书记》目录所列未成卷数相符。每册厚薄相近，以十六开纸大小的红格栏纸书写，每页十一行，行廿二格。其特点概述如下：

1、每册封面均有陈澧题写的总书名，名称并不统一。或作《东塾读书记》，或作《学思录》。除书名外，旁边并有亲笔书写的供备忘或说明的字句。此类题字多寡不一。少者数行，多者竟达八条，计字数十，满布全纸。现举其一二：

此卷要聚精会神，再添材料写出（第三册）

南北朝所采颇少，必要看小册（第四册）。按：这所谓小册，当即巾箱本的《学思录》，亦就是现在的《著稿》，亦足证《著稿》之作为资料备用。

此卷当并入宋儒类，不必别为道学一卷，以祛门户之习也。
（第十册）

稿纸中缝印有“学思录”三字，偶夹有中缝印“东塾读书记”者。可见是分开写校后，再按类次汇订而成的。

2、每册有亲笔眉批。这些眉批有各种各样的性质和用途。例如：

①用以标明篇目的。如《陈太丘》、《魏晋清谈》、《近儒之弊》等。所有篇目均固定写在该页的左上角位置。

②有“发抄”、“已校”、“已抄”、“此篇删”等字样，多在该页的右上角位置。

③作为备忘或指示誊录人员注意事项的批语。如“定”、“此二段分抄不相连”、“此一段亦精要之极”等。

④发挥议论的话。如“通经者惟荀慈明，今人只知易注耳”，“自夸自大始于李翱，此学昌黎而误者也”。

⑤批语是用朱、墨、蓝、紫四色笔写的，当是代表不同时期的批点。其中以朱笔居多，墨笔次之。除批语外，还有四色笔所作的涂抹和圈点。

3、此稿正文基本上为陈澧亲笔，字作行草，时有涂乙。小部分为恭楷书写，则是请他人缮正的。这些抄缮过的文稿亦经陈氏本人用红笔删改、圈点，并批明“已校”字样。

抄缮者计有“何先生抄”、“春海抄”等字及“林抄”朱色印记。何、林不知是何许人，春海则是他的学生陶福祥，字春海。此外，参加抄校工作的还有他的儿子和学生等人。

4、此稿“自咸丰八年，（陈澧）四十九岁时开始动笔^③，其间有所创获则随时编入，或屡加删定补充。至同治五年，陈

澧五十七岁时，十年之间，《学思录》稿已一尺余，所当录者犹未及半，大约明年乃可专力于此”。（汪宗衍《陈东塾先生年谱》页四十六引集外文）到了光绪四年，六十九岁时，他在《杂俎》最后一册《通论》封面上写着：“此帙分入各类，戊寅中秋前二夜记”。戊寅即光绪四年。和上次相距已达十二年了。直到光绪七年陈澧七十二岁时最后定稿，与上次相距为三年。总计前后历时二十余载，多次修改增删。这样做学问的精神，是十分令人敬佩的，难怪他自己也说“取材既博，用力倍劳”了。稿中四色笔的批语有“初定”、“未定”、“定”、“添入”等各种，正是他长期专力于此并反复修改的证明。

5、稿内盖有“己卯年七十”、“辛巳年七十二”两种小方朱印。这可能是两次主要审定手稿的日期。而后一次是在他死前一年进行的，当是最后一次的审定了。

通观《杂俎》全稿，虽属定稿，而尚有增删涂乙、移前接后处，这就尚待整理誊清，写成清稿方能付刻，而陈澧不及待矣。翌年正月二十二日陈氏逝世。稿本不知是什么原因，一直未能刊印，而藏于陈庆稣处。陈是长房长孙，陈澧遗稿由他保管，是合乎情理的。

一九三一年，陈庆稣为了恪遵先人遗训，完成祖父遗业，将《杂俎》稿本加以编录。补缀罅漏，移接妥顺，另行缮录成《杂俎》编录本十四卷（此本亦藏中山大学图书馆），眉目更为清楚，内容方面做到去其重复，补其缺漏，理其条贯。卷目比《杂俎》原稿为多，则是因为有所增补。如增置《唐疏》一卷，注云：“《读书记》目录无，据原稿补。”《宋》则另分出《南宋》一卷，注云：“《读书记》目录并入《北宋》为一卷，今据原稿析出。”另加《余录》一卷、《琐议》一卷，注云：“《读书记》目录无此卷，今补。”这些都是按照原稿内容，揣摩原来作者本意加以分合、增补的。无奈解放后庆稣年事已高，难于付梓，故举赠中山大学图书馆。据说陈氏曾嘱托

中大冼玉清教授代为整理刊行。冼氏下世，原稿如旧，幸未遭十年动乱之劫，则是大幸事了！

陈澧的未刊稿，除《杂俎》为最主要者外，尚有多种散处各地。有藏于其裔孙陈庆贡、汪宗衍处，有流散在国外（如香港大学图书馆藏《学思录》稿一册），而以广东省中山图书馆收藏最多。该馆所藏《东塾读书记稿》十一册，是《读书记》已刊部分的手稿（但不齐全），计有《春秋三传》、《朱子》、《易》、《汉学》等卷。其稿纸、字迹、形式均与中大所藏《杂俎》一致。另外陈树镛亦藏一部分，但历时既久，纵得保存，也难完璧。时人黄荫普编《广东文献书目知见录》，子部载：“《东塾杂俎》十四卷（敬济堂丛书），黄荫普藏”，这是个刊本还是抄本，未有说明。其卷数则刚好与陈庆馥的《杂俎》编录本相同，黄氏所藏，或即据陈氏编录本过录而成的吧？

作为有清一代学者的陈澧，其遗稿将近百年而不获问世，况且这部分是陈氏晚年学术思想转变、心力尽瘁于中的作品，更为值得重视，倘有学者致力于此，为之董理而印行之，使《东塾读书记》能以全璧与世人相见，则不独广东文物得以保全，想亦是学术界所欢迎的。

注：

- ①② 《岭南学报》五卷三四期《陈兰甫先生遗稿跋》。
- ③ 陈澧开始作《学思录》的日期，《考评》定为咸丰七年，汪宗衍《陈东塾先生年谱》据陈澧《自记》定为咸丰八年，当属可信。《自记》原稿藏陈氏裔孙陈庆贡处。